

巴蜀文化的多维视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编



DIVERSITY FIELD OF VISION OF
CULTURE IN BA-SHU

By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蜀文化的多维视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编



DIVERSITY FIELD OF VISION OF
CULTURE IN BA-SHU

By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文化的多维视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主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20-06284-2

I. 巴... II. 四... III. 巴蜀文化—研究
IV. 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5487 号

BASHUWENHUA DE DUOWEISHIYE

巴蜀文化的多维视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张问渔
刘长久
何秀兰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
850mm×1168mm 1/32
8.125
1
181 千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1-1000 册
ISBN 7-220-06284-2/B·207
22.00 元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别具特色，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巴蜀哲学、巴蜀宗教、巴蜀文学、巴蜀艺术、巴蜀考古、巴蜀经济、巴蜀科技、巴蜀少数民族文化、巴蜀神话、巴蜀方言等诸多文化领域。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巴蜀文化以其开阔恢弘的气度，与外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善于吸取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长，创造出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地域文化。并以其自身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其他地区的文化，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1978年建所以来，除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美学等以外，也以巴蜀哲学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陆续发表了有关唐甄哲学思想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论文。1981年哲学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室，重点研究四川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先后研究了扬雄、严君平、赵蕤、李荣、宗密、陈抟、苏轼、苏辙、张栻、魏了翁、杨慎、来知德、唐甄、费密、廖平、吴虞、唐君毅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四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以及四川道教等，并推出一大批研究成果。1987年，哲学研究所改称哲学文化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一度改为巴蜀文化研究室，进



一步扩大了巴蜀文化的研究领域。哲学文化所在涉及巴蜀文化研究方面，由巴蜀哲学研究逐步扩展到巴蜀宗教、巴蜀文学、巴蜀艺术研究等巴蜀文化研究领域，并相应地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年，哲学文化所改回原名，称哲学研究所。但仍以巴蜀哲学、巴蜀宗教、巴蜀艺术等巴蜀文化研究作为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成立二十多年来，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科研人员，先后承担了“四川历代思想家研究”、“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川道教研究”、《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的“四川、重庆卷”（国家重点出版工程，担任主编兼独立撰稿人）、“宋代四川理学研究”等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大量自选研究课题，并积极参与与巴蜀文化相关的其他课题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研究所主持召开或与其他单位合作召开了“四川省首届中国哲学史讨论会”（1982年）、“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1983年）、“唐甄学术思想讨论会”（1986年）、“全国首届张栻学术讨论会”（1991年）、“中华传统文化研讨会”（1992年）、“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995年）等与巴蜀文化有关的学术研讨会。通过这些研究和学术交流，扩大和挖掘了巴蜀文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推动和促进了巴蜀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成为我省巴蜀文化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我省的巴蜀文化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正在四川加紧贯彻落实。巴蜀文化研究也要服务于这个战略，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四川古为巴蜀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与哲学，对四川历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是值得清理、借鉴、继



承和发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通过深入研究巴蜀文化，充分发挥地方文化资源的优势，立足巴蜀，面向全国，突出地方特色，这就要求我们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人们，自觉地把研究工作与现代化事业结合起来，古为今用，服务于西部大开发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四川经济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作贡献。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巴蜀文化的多维视野》论文集，就是我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积极开展巴蜀文化研究的最新集体研究成果，从多维视野的角度论述了广义的巴蜀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是各位作者研究心得的结晶，对读者深入了解古今巴蜀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读者一读。《巴蜀文化的多维视野》作为哲学研究所的巴蜀文化研究项目，得到了院领导和院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该项目的立项，哲学研究所现任书记侯成亚先生、哲学研究所前任所长沈伯俊先生作出了重要努力。该项目的策划、出版，刘长久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也是我们哲学研究所开展巴蜀文化研究，为促进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作贡献的一个具体行动。

蔡方鹿

2002年3月18日

目 录

前言	蔡方鹿 (1)
巴蜀历代传统哲学思想概要	陈德述 (1)
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蔡方鹿 (25)
汉宋巴蜀道家思想介述	黄海德 (51)
从“九字秘诀”的传播看中日文化史上的宗教交流 ——兼及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李远国 (78)
巴蜀佛道艺术瑰宝 ——大足石窟艺术审美谈	刘长久 (100)
自唐至清巴蜀僧人求学“南方禅法”动机考述	向世山 (113)
古蜀别议	朱小丰 (133)
塑造源远流长的蜀水文化 ——兼评《文化苦旅·都江堰》	李万生 (160)
《三国演义》与巴蜀	沈伯俊 (175)
西学入蜀	张桂权 (192)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兼论 21 世纪蜀文化构建	徐 惠 (210)
巴蜀历代治易学者及其著作	陈德述 何志群汇编 (232)
附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巴蜀文化研究成果目录	(243)



巴蜀历代传统哲学思想概要

陈德述



陈德述 1937年12月生于重庆南川县。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原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哲学硕士生导师，现已退休。

哲学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的民族，因而她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其哲学的旨趣、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有别于其他民族，成为世界三大哲学源流之一。四川历代出了不少的哲学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川古代为巴蜀之地。巴蜀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根据吕子方教授和蒙文通教授的考证《山海经》中的《海内经》是蜀人的作品，《大荒经》是巴人的作品。从中看出，巴蜀民族与华夏民族有不同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不同的天文学体系。从考古材料中发现，古代巴蜀有自己的文字。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巴蜀文化与华夏文化不断地进行交流，学习中原华夏文化，但是，巴蜀文化的独特的传统始终保持着。

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在原始社会初期，对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一切都处在必然王国阶段，一切都困惑不解，于是产生了神话、原始的宗教观念、占星术等。这些东西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初步形式，其中包含着哲学思想的萌芽。

古代的巴蜀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神巫观念以及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根据史书的记载：周代的苒宏是古代巴蜀文化传统的集中代表人物。苒宏，四川资中人，长于天文学和阴阳术数。《史记·天官书》记载“昔之传天数者”，“周室史佚、苒宏”，说明苒宏是周代著名的天文历象家。《淮南子·汜论训》中载：“昔者苒宏，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苒宏只有掌握了天地日月运行规律之后，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同时，他还精通阴阳术数，《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景王问于苒宏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雍也。岁在木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以后苒宏被杀而葬



于蜀。裴宏精于术数的学术思想，对以后四川的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据史籍记载，秦国商鞅变法失败之后，曾协助商鞅变法的尸佼恐其被诛，而逃亡到蜀，著《尸子》二十篇，六万余言。《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其学术思想“非先之法，不循孔子之术”（刘向《孙卿子叙录》）。他提出“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的主张，具有综合贯通各家学说的倾向。以后，蜀很快被秦所灭，尸佼之学对四川的影响不大。

二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时期。秦王朝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用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激化了阶级矛盾，短命而亡。汉初统治者总结秦亡的历史经验，崇尚黄老之术，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短短几十年中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但是，用“黄老之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探寻新的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汉武帝时，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儒家的学说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

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文翁治蜀期间，用儒家思想教化人民。还派张宽等十余人，到京城学习儒家经典，回川后，大力推行儒学，“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蜀亦化之”（《华阳国志》）。

汉代学术的典型形式是经学。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文翁的倡导下，四川学子开始治经。治今文易学者有：景鸾的施氏易；孟喜、任安、杜微的孟氏易；折象的京氏易。治今文尚书伏生派的有：杨仲续、杨春卿、杨统、何



宗、杨厚等。治古文尚书的有杨楷等。治今文诗学的有：李业的鲁诗；任末的齐诗；杨仁、冯鸿卿的韩诗等。治古文诗学的有：文立、司马胜、常修业、王化、任伯远、常季慎等。治今文春秋学的有：张霸的公羊严氏学；杨终、张裔的春秋公羊学；治古文春秋左氏学的有：尹默、关羽、李密、寿良等。总之，两汉三国时期，四川学人在经学方面是有不少成就的。他们崇尚今文经学而不崇尚章句之学。

汉代四川著名的思想家有严君平和扬雄。严君平专精《大易》，耽于《老》、《庄》，为扬雄的老师，著有《老子指归》和《庄子注》。严君平继承了老庄的哲学思想，强调“无者生有，虚者生实”的本体观和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在人君南面之术方面，严君平继承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强调“君者民之根”，“务在顺民”思想的重要性。扬雄继承蒯宏重象数的传统，根据天文学的新成就，模仿《周易》而作《太玄》，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其中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在人性问题上，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圣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的新观点。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学术思想方面存在儒、释、道并存的局面。当时四川学者中最著名的有：李鼎祚、赵蕤、李荣、王玄览、杜光庭、宗密、马祖等等。李、王、杜是道教学者，宗、马是佛教学者。李鼎祚著《周易集解》，收集了汉代以来三十五家易注，保存了汉代早已亡佚的易象。赵蕤著《长短经》，强调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

两宋时期的理学是我国哲学发展的高峰，当时的四川是人才辈出的时期，出现了陈抟、苏洵、苏轼、苏辙、张浚、张栻、张行成、魏了翁等知名学者。陈抟首创先天易学，开创易学图书学派；苏轼创立蜀学派；张栻创立南轩学派；魏



了翁创立鹤山学派，这些学派在宋代理学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苕宏开始四川学者有重象数、术数的传统，到宋代术数学大家张行成，著《周易通变》、《周易述衍》、《易元包总义》等书。“易学在蜀”的说法，正好说明四川学术的特点。

从元初到清代中叶，理学逐渐式微，不少学者企图越出理学藩篱，或者批评、或综合创新。这个时期，四川出现了一批在学术上很有造诣的思想家，如赵采、黄泽、王申子、虞集、熊良辅、熊过、来知德、杨慎、唐甄、费密、刘沅等。赵采著《周易折中》，以程朱义理之学为主，兼采先儒象数、变互之学，将义理和象数折中起来。黄泽著《大易辑说》，其说主象数学，以河图配先天卦，以洛书配后天卦，批评陈抟、邵子、程子、朱子之说，一概有误。王申子著《易学滥觞》，认为王弼废象数而遁于玄虚，汉儒之象数失于琐碎，于是力主折中。熊良辅著《周易本义集成》、熊过著《周易象旨决录》，二熊之学亦主象数。以上诸氏之易说与占统治地位的程朱易说是相反的。这一时期，易学成就最大者，是来知德。来氏著《周易集解》，主象数学，以错综中爻解易，多有新见。在义理上，强调“太极”、“阴阳”的实体性，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全都是阴阳二气及其变化而已。虞集为著名理学家吴澄的弟子，主朱陆会合之学，认为朱陆之学大同而小异，吴澄、虞集等“朱陆会合”的思想，对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孕育作用。杨慎是明代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较早举起反对宋学的旗帜，不论对程朱理学，还是对陆王心学，都进行了批判。他提倡实据、实证、实用之学，开清代朴学之先河，中经毛奇龄等人，到了乾嘉时代，蔚然成为盛学。唐甄著《潜书》，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专制制度，都进行了尖锐的深刻批判，提出了具



有早期民主主义意识的政治和经济的主张，特别强调国家要以富民为根本任务，他的思想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费密著《弘道书》，他批判宋明理学“经旨大变”，实非儒学，是杂入佛老之学的“异端”，是于国，于家，于政事，于民生都是全无用处的空虚之学。于是，他提倡汉唐古学，强调实以致用。费密被梁启超誉为“宋元学术革命的急先锋”，被毛奇龄称为是“反宋学的健将”。由此可见，费密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刘沅是四川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其学以阐明孔孟之道为宗旨，他认为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朱熹等人，歪曲或篡改孔孟思想的真谛，致使圣学不传。他们“执私见以妄测圣人”，于是“所言皆谬”。因此，必须首先“辟流传之误”。为了阐明孔孟之道，在研究方法上必须采用客观分析的立场，摈除门户之见。其哲学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内容十分丰富，在清代有很大的影响。

三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由于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上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与掠夺，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者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近代中国处在落后与危亡之中。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救亡图存，复兴中华，人民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革命斗争。在意识形态上，反映这一过程的首先是今文经学的复兴，把古代的今文经学改造成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继之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形成，再继之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与发展，最后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赶走了



帝国主义，建立了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我国近代历史的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复兴中华。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产生了今文经学运动，它的首倡者是庄存与（1710～1788），继承、发展、奠定其基础的是刘逢禄（1776～1829）。其目的是寻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但是，他们只是一般地探索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到了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6）时，开始强调今文经学的变易哲学，依据公羊三世说提出变法维新的理论。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廖平首先提出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孔子是主张更法改制的；同时，还全盘否定古文经学，指出古文经学是刘歆伪造的经典，此说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廖平的学说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廖平（1852～1932）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思想家。他以经学六变闻名于世，一变倡平分今古学；二变倡尊今文经学；三变倡小统大统学；四变倡人天学；五变倡人天小大学；六变倡五运六气学。廖平经学一变时首创以“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学。其一、二变最有价值，三变以后越变越离奇。自谓毕生学说，“专以尊孔尊经为主”，目的是为了改制救弊，保种爱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及其学说多变的需要，廖平在哲学上注重方法论的探讨。

廖平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同时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形成自己的变易哲学和进化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的，到了文明以后，又是不断有变革的，历代的制度都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拘泥株守，必须随时变通，因时改制。

廖平经学在一、二变时，主要采用比较的方法，他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认真加以对比之后，得出了今古学之分本



以礼制为主的结论。由于他采用了近代的比较方法，使之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外，廖平还采用了主观附会法；以小推大法；执中调和法等。他的这些方法与他立学宗旨、价值追求以及学说多变是相一致的。

廖平在近代思想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治经尤邃于《春秋》，著《谷梁古义疏》，由《春秋》而达礼制，首以礼制区分今古学之论。从此以后，治经学者区分今古学者皆以此为圭臬；廖平在二变时，著《辟刘篇》和《知圣篇》，认为古文经皆刘歆伪作，只有今文经才是孔子的真正之学，其主旨是托古改制。康有为全部继承其说，本《辟刘篇》作《新学伪经考》，本《知圣篇》作《孔子改制考》，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可见，创立维新变法理论的首功应推廖平，并以此近代开改造孔子学说的先河；由于廖平全盘否定古文经，康有为、崔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大张其说，实开近代疑古辨伪之风，对鉴别古代历史文献和资料的真伪取得重要成绩，更重要的是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近代四川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不断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也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和方法。1895年5月，杨锐等71位四川爱国志士参加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签名。以后杨锐、刘光第积极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刘光第（1861～1898）四川富顺县人，1895年冬，他在《甲午条陈》中指出：“兹外洋逼我，门庭堂奥，无处不通。”而“今倭已形猖獗，恐俄亦隐然思逞”。面对这一形势，刘光第认为，根本的途径在于变法。中国只有“极力振刷”，才能抵御外侮，才能不至于被“外洋吞占”。所以，刘光第在主张变法的同时，还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其长处，不要“尽失我自有之利，而全承外人之害”。1898年，他在北京创办蜀学堂，招收川籍在京人员，要求他们兼



学中西学业。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刘光第、杨锐等六人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

维新变法时期，在四川积极倡导变法并提出其理论的还有宋育仁。宋育仁（1857～1931）四川富顺县人。1894年4月，被任命为英、法、意、比四国使馆参赞。在出使期间，他对西学和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指出：“西人之蚕食人国，必始于通商，辅之以传教，变其风俗，继以改易治国章程，胁之以兵，令其必从，尽夺其国之主权，但令衣租食税，终于废其国，收其地而后已。”（《守御论》）宋育仁的认识在当时是很深刻的。同时，宋育仁还批评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指出：洋务派“未闻治道，欲一切易中国以洋法，不求其意惟称其法，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有聚敛而官私中饱”，其主张不过是“欲盗威福之柄以愚天下”而已。（同上）还指出：顽固派所谓“立子孙之朝，不宜变祖宗之法”，是“为天下殃”的祸国之说。

1884年，宋育仁著《周礼十种》和《周官图谱》两书，为其复古改制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宋育仁的复古改制理论中，用西学来解释中学及其典章制度，力图说明西学和西方的国家制度是合乎我国古代圣人之道、先王之制的。变法图强为什么采取“复古”的形式呢？他指出：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而四海无不服，舍此而再思其次，则无策以自救；用此则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蜀学报》第8册）“复古”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在此基础上，宋育仁提出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改良主张。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要救亡图存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必须进行革命。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不少革命志士进



行英勇的斗争。邹容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四川的第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1885～1905）四川巴县人，1903年末出版《革命军》一书，站在哲学的高度，论证了革命是宇宙演进的普遍法则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环节，同时还认为，革命是拯救中国的惟一途径，舍此别无他途。《革命军》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不少人迅速与改良主义决裂，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封建势力并没有被打倒。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为了复辟帝制，掀起了一股尊孔尊经的逆流。四川的尊孔复古派也推波助澜。吴虞则是四川迎击尊孔复古逆流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吴虞（1872～1949）四川成都人，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是成都地区主张新学的第一人。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去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思想。1907年回国后，积极开展对封建道德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从1917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以及一系列批判孔子的文章，闻名全国，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文录序》）

吴虞运用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首先批判儒家的“孝”和“忠”，指出：儒家以“孝悌”来联结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干，“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事君不忠，非孝也”。还指出：“其实他们就是利用忠孝并用，君父并尊的笼统说法，以遂他们专制的私心。君主以此为教令，圣人以此为学说，家长以此为护符，却怕有人看破他们的手段，揭开他们的黑幕。”“家族制度之专制政治，遂胶泥而不可分析。”“孝忠”是用来掩盖专制统治之本质的。其次，还对封